

谢幕

潘敦

几年，没有南橘北枳的尴尬反倒有风生水起的模样。朱先生单名一个“铿”字，和民初护国将领蔡松坡同名，我们不叫他老朱都叫他大铿。那几年大铿的生意应该很好，开了酒店又开设计公司，连北京一间拍卖行里都有他的股份，沉迷旧物痴迷古董，他说他人股拍卖行只为了收货看货方便，倒是不图赚钱。那间拍卖行的预展我去看过几次，场面不大，架势不小，竹木牙角玩器物又多又精，铜炉雕漆印章紫砂也不输给几大拍卖公司，气质与大铿相仿，是北方拍卖行里的南方种子。每年春秋拍秋拍大铿出手都很大，我劝他收的道光卢葵生刻漆笔盒他纳入囊中，我嫌价高劝他别买的明代德化窑白瓷茶壶他也竞标得手，买完了有些拿回家锁进柜子有些索性就留在公司库房，“平时太忙我没时间伺候这些宝贝，留着等我退休了再和它们朝夕相对。”十足公子派头！

大铿真的很忙，平时他住北京我往上海，一年见不了几面。有一回我在台北买到一张楠木横匾，苍松古旧，“古槐轩”三个字刻的是吴昌硕的行书，比篆书少见，木匾运回上海那天我拍了照传给大铿共赏，谁知他看了照片第二天就飞来上海，一定要我加价转让。他说他父亲画了一辈子的画，退休前在杭州中国美院当教授，年轻时是浙派名家吴弗之的入室弟子，还跟过美院院长潘天寿，作过潘先生的助教，算起来应该是吴昌硕的再传。我是家中独子，父亲从前一心想让我走他的老路，画派里少见的写意人物，我小时候淘气，冷墨枯笔前根本坐不住，父亲气急了没少打我，谁知道越打我越冥顽，终究不能让他如意。“西窗透进一缕斜阳暗自拖地，幽幽沾上靠着墙根的横匾，老楠木看起来更温润几分。”前几年父亲把旧藏的李叔同、黄宾虹、潘天寿分批捐给了几间美术馆，我知道他还是生我的气，书房里若挂上吴昌硕的横匾我也算认祖归宗，父亲看见了也许会明白我的心思。中国人向来含蓄，学不来西洋人的跪地伏身更学不来西洋人的拥抱热吻，挂一张横匾求一点体谅好像是书香门第里的两代情深，那天傍晚大铿抱着横匾回了北京，我没加价。

大铿越来越忙，偶尔互通简讯他总是回得很慢，我怕耽误他的正事，很少打扰。去年春节前几天大铿来电电话是去杭州陪父母过年绕道上海，想和我见一面。那天我请他在家对面的日式小馆喝清酒，半年多不见大铿瘦了，鬓角更添白发几茎。大铿说本命年里诸多不顺，酒店重新装修有工人意外坠楼；百货公司生意竞争激烈，股东里有人要退出有人想争权；拍卖行征集更难，征到了也都天价，买不动，不好玩。“有人出价想要我那些股份，我答应了，算是贱卖，不算亏本，父母都快九十了，我该回杭州陪他们养老。”我端起酒杯恭喜他终于提早退休，终于回到江南，终于有时间亲近他那些骨董珍玩，大铿举杯饮尽，眉角舒展很多。

追看塞尔福里奇故事那几天我想起过大铿，也想起十来年前黄伟文写给谢安琪的那首《年度之歌》，“回望昨天剧场深不见底，还是有几幕曾好好发挥，还愿我懂下台的美丽，鞠躬了就退位，起码得到敬礼。”剧终塞尔福里奇在百货公司中庭深深一躬赢得满堂喝彩掌声雷动，走出商店大门，他的女朋友May就站在那里等他，梅说：“我想去巴黎，想去米兰，想去罗马，你准备好了吗？”离开伦敦，世界真大。

塞尔福里奇（Harry Gordon Selfridge）1858年出生于美国的威斯康辛，父亲老塞尔福里奇原来是杂货店老板，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后志愿入伍，连战连捷，晋升少校。四年后战争结束，老塞尔福里奇却不愿衣锦还乡，抛妻弃儿，只身远走。小塞尔福里奇从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十四岁离开学校，做过报童，进过银行，卖过保险，十八岁经人推荐去了芝加哥 Marshall Field's 百货商店，事业发展才算有了眉目，风风雨雨二十五年，终于从学徒升到合伙人，据说“顾客是上帝”（The customer is always right）那句话是从他口中说出，转瞬流传，成了业界名言。

1904年，塞尔福里奇先生结束了芝加哥的生意从此悠游乡间，两年后偶然到伦敦度假，却发现帝国的中心竟没有一间百货公司衬得起它的门面。生意人退休了还是生意人，买地，盖楼，开店，1909年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在伦敦牛津街的西面落成营业，古老帝国的落日余晖从此照亮摩登城堡的锦绣橱窗。姹紫嫣红，光影流年，百货公司撑过了草创，熬过了欧战，眼看着全球萧条都扛得过去，却还是输给了塞尔福里奇手中中崩的纸牌和身边迷离的舞姬。信用破产，供货中断，股权易主，逝水狂澜，塞尔福里奇先生一世传奇，晚景黯淡。

2013年，英国 ITV 把上世纪这位百货业巨子的兴衰故事搬上电视屏幕，每年十集，连续四年边拍边播。今年农历年假那几天我刚追完结局。最后一季塞尔福里奇和伦敦一位报业大亨交恶，撤去百货公司在那家报纸上的所有广告，报业大亨不甘示弱奋勇反击，旗下记者挖出塞尔福里奇的花边新闻连带曝光他欠股东的陈年旧账，塞尔福里奇被赶出董事会的那天报纸主编亲自拟了新闻稿的黑体标题，“Harry Selfridge Ousted”，简直昏君被黜！清样送到大亨手里，他轻声念一遍念出几分恻隐，动笔划掉那个幸灾乐祸的标题改作“Earl of Oxford Street Bows Out”，牛津街伯爵是伦敦商界从前送塞尔福里奇的雅号，伯爵先生鞠躬退场，听起来体面很多，君子反目用不着去学鲁迅，没有痛打落水狗的必要。

我的朋友里有一位朱先生也开百货公司，经营有方，南方人腾挪到北方十

放学妈妈来接我时，我指给她看我们的班长王琦，我在家说他“很漂亮”。妈妈说：“不漂亮呀？王琦挺胖，笑起来眼睛一眯缝。我改口说：“我说的不是他，是副班长——”

副班长是汤轩，他倒真称得上漂亮。肤色微黑，相貌端正，很有“派”——他那么小就很有派，像个领袖，遇事微微一笑，自有办法。他有一身海军队服，还有海军帽，穿戴起来，和他极相衬。“汤司令”，大伙儿这么叫他，姓汤的人外号就叫汤司令，这外号给他特别正确，他来了，就有拥趸们捧场的吆喝：“汤司令到——”

小学一年级的班长，是出于某种契机由老师指定的，因为一入学就得有个班长，老师第一眼看着谁好，先让他当着；副班长就有时间选拔了，开学了一阵子，老师看人看得比较清，选的人肯定是很聪明能干的。这道理我当时自然不懂，我的天性属于顺民，对老师指定的班长、副班长，都有仰视之情。而不久我就成了汤轩的后任，从那之后一直沿袭。我跟汤轩一直关系比较好，大约有这个原因，或者是与此相关的：都成绩好、都爱画画、都在班上负责某些事情。有一回我们都选为优秀学生，到市里去开表彰大会。在那里，一位五十多岁的女老师，热情洋溢，伸开双臂，一边一个把我和汤轩搂在怀里，说：“你们都是我的好学生哪！”她搂得很紧，久久不放，还小心地转了圈子。我从来没碰到过如此热情的老师，有点别扭，又不能挣脱开，只能陪同她抒发情感。我和汤轩被卡在她一左一右的怀抱，四目相对，我从他的眼神知道，他的感受与我完全相同。

这大约是二年级或三年级的事。我要写的，是四年级的事。那天下午放学后，我和汤轩到一个邮电部门的大厅去玩，我带着我的集邮册。我的集邮册开始于三年级的暑假，我随妈妈回广东探亲，广州的小表哥送给我许多邮票，还带我到南方大厦买了这本集邮册。我回来以后，就把家里所有的信封上的邮票都收集了，一张张剪下来，泡水，剥离，晾干，入册。我家有不少好邮票，因为有一些香港、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来信。外国邮票很漂亮，色彩艳丽，和中国邮票的素雅很不一样，那些外国文字，也像一种花边装饰。香港邮票是各种颜色的女工侧面头像，红的，蓝的，紫的。我认为最特别的是小表哥送给我的两张日本邮票：大长方形，纯白色，没有图案，只是红色的

波浪形邮戳，旁边有仿佛是篆体的“日本邮票”字样。等我长大后有逻辑思考能力之后，我想它们可能并不是邮票，而是某种邮品，不然它们也不会留下来，在经过了我要讲的事情之后。我的集邮知识并不多，邮票于我，只是一种好看的小纸片。

那天我和汤轩去那个大厅，是为了找人交换邮票。交换邮票是集邮的一项活动。集邮爱好者把自己重复的邮票，跟人换取需要的邮票。我知道这个，但我带去的并非重复多余的邮票，而是我的全部邮票。我愿意把我的集邮册给人看，本来我也是去玩的，如果真要换，也是玩。我看了一圈别人的邮票，又看过了柜台里展示的新上市邮票，准备离开时，有人从后面拍了拍我的肩膀。

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老者。他郑重地看着我。“要换邮票吗？”他问。

“是的。”我答道。

“好，我们到这边来坐。”

他走到一张玻璃桌子前，坐下来，并请我坐在他对面。他把裹在大衣里的我的集邮册拿出来放在面前，也把我的集邮册放在面前。这场面摆开了，大厅里其他交换邮票的人，渐渐都围拢过来。

“让我看看你的邮票。”老者说。他把我的集邮册拿了过去。

“你也看看我的。”他说。

于是我就看他的。场面集中于他看我的集邮册。他

汤司令

蔡小容

在我心里逐渐深刻而清晰的是当年那个男孩子的作为——他像个堂·吉珂德一样，于危急中慨然上阵，竭力想挽回同伴女生的荒谬败局。那年我十岁，一个愚蠢的小女生，他也十岁，却已是小男子汉。他与那老家伙对阵，不仅是要维护朋友的利益，也是在维护孩子的尊严！

波浪形邮戳，旁边有仿佛是篆体的“日本邮票”字样。等我长大后有逻辑思考能力之后，我想它们可能并不是邮票，而是某种邮品，不然它们也不会留下来，在经过了我要讲的事情之后。我的集邮知识并不多，邮票于我，只是一种好看的小纸片。

那天我和汤轩去那个大厅，是为了找人交换邮票。交换邮票是集邮的一项活动。集邮爱好者把自己重复的邮票，跟人换取需要的邮票。我知道这个，但我带去的并非重复多余的邮票，而是我的全部邮票。我愿意把我的集邮册给人看，本来我也是去玩的，如果真要换，也是玩。我看了一圈别人的邮票，又看过了柜台里展示的新上市邮票，准备离开时，有人从后面拍了拍我的肩膀。

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老者。他郑重地看着我。“要换邮票吗？”他问。

“是的。”我答道。

“好，我们到这边来坐。”

他走到一张玻璃桌子前，坐下来，并请我坐在他对面。他把裹在大衣里的我的集邮册拿出来放在面前，也把我的集邮册放在面前。这场面摆开了，大厅里其他交换邮票的人，渐渐都围拢过来。

“让我看看你的邮票。”老者说。他把我的集邮册拿了过去。

“你也看看我的。”他说。

于是我就看他的。场面集中于他看我的集邮册。他

看，围观的人也在旁边看。我的集邮册，内容真的很丰富，那丰富超过了我的知识掌握。我只知道我有些外国邮票是公认的好邮票，围观的人们都是懂的，他们无声地欣赏着。

“我来跟你换邮票。你可以要我的，我也可以要你的，一张换一张，对吧？”老头儿说。

我点点头。

“好，你先挑。”他说。

我翻着他的集邮册，不知道挑哪张好。他的邮票很多，这还是他重复多余的一本。我甚至不记得我挑了张什么邮票，反正是中国的，图案让我比较喜欢的，但不是非常喜欢，否则我会记得是哪张。

“好。”老头大方地说，“现在我挑一张你的。”他用镊子，夹去了我册子里的一张外国邮票。

第二回合，也是这样。我坐在了一个我从未体验过的场面中央，被众目睽睽，被长辈指导，被抽去了思考。只能按规矩行事，他挑一张，我挑一张。我忘记交代了一句，汤轩坐在我身边，他和我一起坐在老头的对面。

我还是挑了一张中国邮票，老头还是挑了一张外国邮票。

“这是她自己挑的，对吧？都是按规矩来的，是吧？”老头对围观的人们说。他看了他们一圈。人们没有异议，只是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大厅里的人都聚拢来了。

老头再次拈走我的一张好票之后，人们非常沉默，摒住了呼吸看我再怎

么挑。我更不知道该怎么挑了。我怎么挑都是他富余的，他怎么挑都是我孤本的。他挑我哪张我都得答应，不能说不，因为他的全本也都任我挑，他决不说，老头一再强调这一点，给在场的所有人听。

汤轩低声给我一些暗示。他的暗示都是根据集邮的常识来的，哪张更好，哪张更珍稀，哪张更有价值。我听着，但没怎么听进去。我在关键时刻容易心不在焉，在常识问题上总是犯白痴。我甚至在如此严峻的局势中完全不忧虑——有这么多人替我忧虑呢，我跟着我头脑中旁逸斜出的念头走了。

众望所归，我出手了。我挑了一张国产的，我觉得还比较别致的邮票。——决不崇洋媚外，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一付诸实践果然惊世骇俗。

人群爆发出一声惋惜的感叹！观棋不语真君子，他们再是不加评论，这声强烈的感叹也是最明显的表达了。我抬头看看他们，八十年代初的他们，男女老少，他们淳朴的、道德的脸上，写满了惋惜与同情。

老头在如此的世道人心依然风度不改。“这是她自己挑的，对吧？我所有的邮票都任她挑，是不是？”他说给所有的人听。大家都没话说，既然我自己要这么挑，谁还有话说？

汤轩的脸涨得通红。他不再跟我低语了。从这时起，我退到了局外，由他来接替我与老头对垒。

我就真成了个局外人，看红脸的汤轩一来一住地跟老头交兵。他动用了他所有的邮票知识，尽力择优而取。他显然是比我要难度大的对手，但依然不在老头心上，只是汤轩上场，局面比我在哪里要正常得多。

我们怎么赢得了呢。本来基础就不对，谁让我把全部家当都带去跟人交换的？全然不知珍惜，想法又出奇。我们怎么对付得了那个老头啊。在完全不对等的交易中，他时时不忘向众人展示这交易的公平——他是讲规矩的，是么，大家有眼都看得见。我不记得事情怎么结束的，反正老头收获颇丰，我别的记不得，只记得我最难得的一张有年头的外国邮票也被他挑走了。

老头走了，人群散了。回家的路上，汤轩气得不想跟我讲话。

“他拿了最好的，你挑那么一张！”他说了这么一句，其余的表达都在他神态上了。

我是一副仿佛这些邮票都不是我的样子。

当时我没心没肺，只是模糊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这件事情多年来一直存在我心里，一年年过去以后，它才慢慢清晰起来，它的意义逐渐凸显出来。

不是为了邮票——即使在若干年后，我对那些邮票也没有特别地惋惜。“小容的邮票都给人骗走了。”这是后来我从妈妈那里听来的我爸的评论。当年回家以后，糊里糊涂的我，并没把事情讲清楚，可是，还用得着讲么，我爸一下子就知道了怎么回事了。倘若当时他在场，而在场的女孩又不是我的话，他肯定会众而出打抱不平：“你欺负小孩子！”他会指斥老头，叫停不公平交易；而假设就是我，就是那真实情况正在发生，我爸又正好路过，他说不定就旁观了，以此给我一个教训。我和我爸天生一个德性，不知道自己怀中有奇珍，随随便便就给人了，所失又何止那几张邮票？

在我心里逐渐深刻而清晰的是当年那个男孩子的作为——他像个堂·吉珂德一样，于危急中慨然上阵，竭力想挽回同伴女生的荒谬败局。那年我十岁，一个愚蠢的小女生，他也十岁，却已是小男子汉。那个道貌岸然的老头子到底在干什么，除了我，周围所有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的注目与感叹，都是在鞭笞汤轩的脸——这女生是跟汤轩一起的，他不出手谁出手？他与那老家伙对阵，不仅是要维护朋友的利益，也是在维护孩子的尊严！

最可恶的是，我还那回事不关己似的，让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了他一个人身上——很多年以后，我自己身处类似的情境时，才恍然大悟。

他虽气，却也只说了那么一句，后来我和他都再也没提过这件事情。十岁的他真像个爷们儿，绝不多话，事情过了就算。

我们初中还在同一个学校，高中不在了。大学，他好像是在和我共一个山头的大学，又好好像不是，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在十七八岁的年纪，我和他碰到过一次，他带着笑意点点头：“还好吧？”

彼此是知根知底的老熟人，多少年不见也是熟得很的感觉，三秋不见如隔一日。他这声招呼 and 自然而然的神态，都是他上小学时就有了的。他好像天生就对人情世故有所领悟，他很有这种能力，会做人，肯来事，神气。

他从小就是汤司令。



久远的记忆

(油画)

孙志纯

近读录

水利巨集出东南

王家范

尝试京东商城，果然没几天，崭新的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精六册送到家。虽有四座电子版，但四幅手绘苏州府及所属各县水系、水道图，十分珍贵，新版印制清晰，就冲这些图，花三百大洋，也值。

好多年前，我在《明清史料感知录》中介绍过张国维。这次却说他出任应天等十府巡抚的七年时光里，编纂成七十万言《吴中水利全书》，为中国迄今所存篇幅最巨的古代水利专著。欲知东南农业社会的基层状况，亦是不可不读之书。

张国维于崇祯七年三月十六日陞辞离京，四月十七日进入六合，与前任完成交接。随即轻车简行，到各地考察。他在《全书》“序言”里有一段追忆，说自己屢次赴京，路过此境，以为苏松两郡“土性沃肥，顷亩可获钜粟，家露积而户困乏”，官税之重亦理所当然。有人叫苦“具区中汇，跨三州，纳百川，污邪之疇，农人告匮。云遇丰稔，亩入詹石，半输公府，歉则仰屋坐榻。自万历戊申后，十常八灾，蚩蚩之氓，膏血已殚”，他以为只是哭穷而已。待到上任实地考察，转了一大圈，梦破惊魂，心情骤变暗淡：“固石凋残，蜡歌绝响，追迫之案山积，有司停俸饷，补过不遑。即数百万漕粮，亦从两部鞭笞得之。国维心痛焉。”

洋人说中国事，颇如隆冬腊月堆雪人，自己玩得高兴，哪管“他人瓦上霜”。本国学者为“唱红”明史，置许多“反证”史料于不顾，把嘉、万

“盛世”的东南说得白银流溢，完全不懂得“最繁华时也是最悲凉”，胡天野地，就完全不应该。如《全书》说：嘉靖“四十年，春夏秋大水，高低尽成巨浸，波涛野野。苗初插，吐花成粒，一切皆害。城郭署民居倾倒几半，郊外数十里无烟火，流离载道，饿寒相枕。水至明年始退。此为有明第一洪水大患”。袁衷明史大佬应该熟悉此段掌故，何遗忘如斯？《全书》卷八《水年》，不惜篇幅，对自汉始元元年明崇祯八年间苏松水旱灾害记录作了系统整理，触目惊心。为省页面，忍痛略去。

在崇祯七年至十四年张国维任职期间，顾亭林已离乡北上，相互间不可能有交集，也尚未找到亭林得见张氏《全书》的证据。两人对东南水利的关注度，出乎天性，心心相印。例如亭林在《日知录·治地》一则中即云：“古先王之治地也，无弃也，而亦不尽地。田间之涂九轨，有涂道矣。遗山泽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作法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难坏，年计不足而世计有余。后

之人一以急迫之心为之，商榷决裂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荡然。宋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之水利亦塞。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人。”特感慨“古之通津巨渎，今日多为细流矣！”

张氏《全书》虽比较生僻，皇皇《天下郡国利病书》，则学界无人不晓，究竟有多少人从头至尾通读过？据说左宗棠放置案头，常加翻阅，被人窃笑为读“无用”之书。当年创刊印先生手稿，使之流通天下的张元济先生，我想是前后通读过一遍的。惟其如此，元济先生点睛传神，云：“亭林身婴亡国之痛，所言万端，而其所再三致意者，不过数事，曰兵防、曰赋役、曰水利而已。”（《四部丛刊》三编本《利病书》“跋”）亭林致意于水利，感慨“古之通津巨渎，今日多为细流”时，特别提到了“崇祯时，有辅臣徐光启作书，特详于水利之学”，此应指《农政全书》。由此推测，对徐光启编译“泰西水法”，眼光开始向外，亭林也不持异议。在此之前，

崇祯十二年，张国维看到《农政全书》书稿，十分高兴，立即指示松江知府赞助徐氏梓印出版，并为之作序（《张忠敏公遗集》卷五）。英雄惜英雄，缘于心灵相通。

推广张元济先生之意，在东南地区，无论是判断地方执政官员政绩，还是官绅编纂方志的水平，对农田水利、赋役改革看重与否，是检验优劣的一大标志。

即以昆山嘉靖、万历两县志作比较。嘉靖志扬名在前，然无人物水利图，又无水利专志，特多人物传记、文选载录，我一直以其文人习气过重而诟病之（乾隆《陈墓镇志》同病）。万历志因大陆久无传本，稍后方被人注意。此志虽出于太学生周世昌之手，但于山水、水利方面用力之深，不愧为史家大手笔。全志《凡例》即云：“水利为东南要务，所宜亟讲者也。故举前水利说，及已行而有成绩者，悉载之以备采择。”卷一《山川》中，叙“山”不到十一页，“江河”下分列各河港湖荡，极其其细，总计十六页，远较嘉靖

志为详。卷二《水利》更为嘉靖志所无，首起熙宁三年邑人（宜兴）郑宣自广东机宜上言“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无过于苏州。苏州属邑莫过于昆山”，备载其“苏州水利六失当去，六得当行”与“治田利害七事”。下敷陈各代水利之说，至嘉靖中，更详录归有光《三吴水利论》（顾书、张书并录）；迄至隆庆六年申息科开浚夏界浦，全卷篇幅多达二十八页。更难得的，卷末有按语云：“成化以前，朝议屡遣重臣经营浚治，故无壅塞之患，迨今百年无及此者……隆庆三年巡抚御史海公瑞亲访其事，慨然以为己任，募工兴役，赴者如归，民无加赋之苦，官无迎接之劳，夫无报扰之累。自宋家港开挑，至嘉定县水渡，及百余里俱已疏通。方至昆山县，遽以事去。岂非昆民之不幸乎？当道者诚能选择而委任之，以竟未垂成之业，则拯吾民之溺，特在无一举手之间耳！”特挑出海瑞说话，言之殷殷，直切时弊，委婉讽刺当政，真亭林先生所言“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矣。小秀才周世昌“水利”的大见识，与进士知县方鹏“玩文”的小趣味，狭路相撞，亦堪称乃时奇闻。

由周世昌《万历昆山志》，追溯归有光水利之论，更寻范仲淹以来宋元诸说，即知亭林《利病书》、张氏《水利全书》，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实有东南泽国、三吴水乡深厚的地理学基础与人文素养作根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敛华就实，救弊扶衰”，清代“实学”发端于东南亭林，岂偶然哉！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